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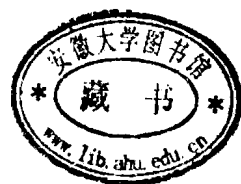
四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3 冊

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

孫永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孫永忠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4+23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編：第3冊）

ISBN：978-986-6831-23-2（全套精裝）

ISBN：978-986-7128-96-6（精裝）

1. 類書－中國－歷史 2. 類書－研究與考訂

040.8

96004330

ISBN - 9867128966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編 第三冊

ISBN：978-986-7128-96-6

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

作者 孫永忠

主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版 2007年3月

定價 四編 30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

孫永忠 著

作者簡介

孫永忠，字恪誠，江蘇省阜寧人。輔仁大學文學博士。目前任教於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文學史、古典詩詞曲選、書法、書畫藝術欣賞、應用文等課程；另兼輔仁大學「東籬詩社」指導老師。著有《朱希真及其詞研究》、《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公文寫作》、《實用書牘》、《應用文》。

提 要

本文經由歷代書目對類書歸部命名綜合整理著手，引領出以往學界對類書義界不清的現象。隨著歷代書目調整類書歸部的現象，可以了解學者對類書性質與地位雖然多所探索，但囿於四部分類傳統成見，不無牽湊籠統之弊。本文藉書目難承「綱紀群書，條析學術」之職，以凸顯類書義界亟待澄清，範圍亦須嚴格規範，方能深入研究類書淵源與體例的必要性。

其次，本文進一步嘗試界定類書定義。書籍體例本常因為需求與編輯能力提昇而更易，要為一種因時因勢而新變的書種定義，並非易事。本文歸納前人研究，設定類書義界，確認類書之特質，並在編輯體例與內容上，比較類書與「政書」、「百科全書」等其他相近體例書種之異同。

再藉由類書義界，仔細析辨以往諸多類書起源說，如：張舜徽《爾雅》說；汪中《呂氏春秋》說；鈕樹玉《淮南子》說；袁逸《洪範五行傳論》、《新序》、《說苑》說；王應麟《皇覽》說；晁公武《同姓名錄》說等，確定《皇覽》為類書起源。其後再就「基礎條件」與「需求」為軸，深入探討《皇覽》之所以產生在三國的主客觀條件，以為曹魏確實已兼具成熟條件，方能創出類書的新體例，為千古的類書發展史寫下首頁。當《皇覽》這第一部類書誕生時，也同步成就類書的原始體例，本文以文獻資料推斷從《皇覽》到《藝文類聚》，其中眾多的類書編修體例，基本上都以《皇覽》為典範，但是在體例上因需求的刺激變化，而有了新變。

當類書體例在《皇覽》形成、六朝增進後，隋唐以降出現許新作，促成類書的地位與品質逐漸提升，一定有其背景因素。本文以承先啟後的宋代為例說明，歸納出以下結論：隋唐以至清末，中國政治型態、社會結構、中心思想等都保持在一個穩定的程度。各代君王推行文治，通常注重文教，整編圖書，舉行科舉。人們普遍重視圖書資源，尤其在印刷術發達對類書發展有很大助益。有了優渥的基本條件，類書的編撰與發展，仍然得「需求」動力促成。因此，本文以「需求」為主題，探討隋唐以降，體例有代表性革新之類書。藉由皮亞傑發展心理學理論輔助探析，歸納出類書因需求，而逐步提升與精緻其功能性。藉此可以更進一步了解，《皇覽》所創之類書體例，由初步的形成到總其成的《古今圖書集成》之間，始終保持一種新變的能力，在不同時代呈現其文獻的功能。



目

錄

第一章 導 論	1
壹、研究動機	1
貳、研究範圍與方法	5
參、結 語	7
第二章 歷代書目中類書的歸部檢討	9
壹、問題的引出	9
貳、類書在歷代書目的歸部情形與名稱分析	12
一、《中經新簿》——將《皇覽》歸附史部	12
二、《隋書·經籍志》——將《皇覽》入子部雜家	13
三、《舊唐書·經籍志》——出類書於雜家，別立「事類」目	16
四、《崇文總目》——始以「類書」名	16
五、《新唐書·藝文志》——類書歸部與《崇文總目》同	17
六、鄭樵《通志·藝文略》——首倡類書獨立為一級類目	20
七、鄭寅《鄭氏書目》——拔類書與四部抗顏行	21
八、《宋史·藝文志》——更名「類事類」	21
九、《文淵閣書目》——類書與其他三十八類者並列	22
十、陸深《江東藏書目》——類書提為一級類目	22
十一、高儒《百川書志》——歸子部稱「類書」	23
十二、焦竑《國史經籍志》——稱「類家」	23
十三、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附史類稱「類編」	24
十四、胡應麟《二酉藏書山房書目》——別錄二藏、贗古書及類書為一部	24
十五、徐燊《紅雨樓書目》——稱「彙書類」	24
十六、祁承燾《澹生堂藏書目》——獨立一級類目	25
十七、錢謙益《絳雲樓書目》——一級類目稱「類書類」	25
十八、錢曾《讀書敏求記》——一級類目稱「類書」	26
十九、《明史·藝文志》——子部類書	26
二十、《四庫全書總目》——歸入子部稱「類書」	27
二十一、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一級類目稱「類書」	27
二十二、張之洞《書目答問》——歸子部稱「類書」	28

參、結語	28
一、歷代書目對類書歸部命名綜合整理	28
二、屈從四部所造成的問題	30
表一、類書在官修書目中歸部情形與名稱	33
表二、各代私家書目中類書歸部與名稱舉要	34
第三章 類書義界	35
壹、分類的形成與運用	35
貳、類書義界	37
一、前人對類書義界的分析歸納	38
二、以《皇覽》、《藝文類聚》、《初學記》求驗歸納結果	40
參、類書義界與其他工具書的異同	41
一、類書與現代百科全書	42
二、類書與辭書	44
三、類書與叢書	45
四、類書與政書	45
五、類書與其他體例書籍	46
第四章 類書淵源各家說法探討	47
壹、類書淵源各家說法剖析	47
一、《爾雅》	48
二、《呂氏春秋》	53
三、《淮南子》	57
四、《洪範五行傳論》、《新序》、《說苑》	62
五、《皇覽》	72
六、《古今同姓名錄》	78
貳、結語	82
第五章 類書創始於曹魏的因素探析	83
壹、曹魏已具類書編纂基礎條件	83
一、大量的藏書，為類書編輯文獻後盾	83
二、曹魏初年經濟狀況良好	87
三、紙張的大量使用	91
四、書籍編撰的分類系屬能力成熟	96
五、抄撮的能力提升	99
貳、需求糾合了基礎條件，形成新體例書籍	101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類書的體例	105
壹、魏晉南北朝類書體例考述	106
一、宋、齊類書	106

(一)《史林》	106
(二)《四部要略》	106
二、梁、陳類書	107
(一)《類苑》	107
(二)《華林遍略》	108
(三)《壽光書苑》	110
(四)《法寶聯璧》	110
(五)《學苑》	111
(六)《鴻寶》	112
(七)《語對》、《語麗》	112
(八)《書圖泉海》	112
三、北魏、北齊類書	113
(一)《帝王集要》	113
(二)《修文殿御覽》	113
貳、魏晉南北朝類書體例考證	116
一、各類書體例間之關係	116
二、以敦煌殘卷為據，探《皇覽》體例	116
參、魏晉南北朝類書體例成就	118
一、另闢蹊徑，採事物分類體系	118
二、二級類目的創立	120
三、註明資料出處	120
四、增列小注	121
五、以《易》思想建立部卷數	122
第七章 類書發展所需基本條件探討——以宋代為例	
說明	125
壹、基本背景	125
貳、宋代社會「尚文輕武」的風潮	125
一、君王愛讀書、重文治，為天下先導	126
二、國家與私人藏書豐富	127
三、重視由教育培養人才	128
四、科舉舉士受到朝野重視	130
五、雕版印刷術的進步	132
參、結 語	134
第八章 隋唐以降類書體例的發展狀況分析	137
壹、需求為類書體例新變的動力	137
貳、以發展心理學理論輔助探析	139
參、隋唐以降重要類書體例新變分析	141

一、《藝文類聚》體例的創新	142
(一) 創造「事文兼具」的新體例	142
(二) 廣泛地採用了參見法	143
(三) 訂定類目依照天地人事物的順序	144
(四) 《藝文類聚》體例呈現教化功能	145
二、《初學記》體例的創新	146
三、《韻海鏡源》體例的創新	149
四、《事類賦》體例的創新	150
五、《冊府元龜》體例的創新	151
六、《事物紀原》體例的創新	154
七、《記纂淵海》體例的創新	155
八、《玉海》體例的創新	157
(一) 本書部類之設立，講求實用	157
(二) 強調「貫串奧博」之功	157
九、《永樂大典》體例的創新	159
(一) 「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體例	159
(二) 取材方式整體化，提高文獻價值	161
十、《三才圖會》的體例新創	162
十一、《古今圖書集成》體例的新創	165
(一) 創制了三級分類體系結構	166
(二) 創設「複分項」	166
(三) 創制以內容主次分列，事文間出的新體例	167
(四) 加強圖譜的運用	167
(五) 首創「表」、「列傳」的運用	168
(六) 目錄的完備	167
肆、類書體例日漸精進	168
第九章 結 論	171
壹、綜論類書的淵源與體例形成	171
貳、類書編纂的展望	172
表一、《中華大典》經目表（草案）	177
表二、《中華大典》緯目表（草案）	178
主要參考書目	179
附 錄	199
壹、類書專題研究論著目錄（1911～2005）	199
貳、古籍類書圖版	223

第一章 導 論

壹、研究動機

當人類文化資料透過文字記載，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人們會自覺的開始選擇、分類編纂工作，期望藉著對過去經驗的累積，保證對新生活有較高的安定性。可是，隨著文獻資料的日益增多，新的社會需求出現，人們無法滿足原有的圖書編輯方式。愈來愈豐富的文化活動，使得人們對典籍的需求度日益增高，如何能更有效快速的掌握知識，成為編輯者新的課題。於是，新的編輯概念與方法便不斷的產生。

今之稱類書者，始於《皇覽》。在曹魏時期，類書是一個新的文化產物。人們在大量的文獻資料基礎上，把龐雜的典籍內容節選，以類匯集，打破所有文獻的體例，重新組合成一個有機體，使讀者讀一部書而可迅速掌握知識全貌。這種編輯活動，必然是在面對大量文獻資料後，編纂者運用新的指導思想，通過對原有文獻資料的加工整理、優化重構，使舊的材料煥發出新的生機，以新面貌出現在人們面前。

類書內容既是從眾多典籍摘擷原文，再安置於有系統的類目中，而構成的資料彙編。故目前所見的類書內容涵蓋面多極為廣泛，舉凡經、史、子、集、釋、道等中國最重要的文獻幾乎都囊括在內。內容是歷史、文化、社會、政經、學術、思想、藝文等各層面，是全面、多種或專門知識的彙輯。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稱「兼收四部，而實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註1〕}甚至由結構與類目的設計中都包含特殊意義，可以反映出人們對該時代知識體系的整體概念。

〔註1〕〔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子部四十五·類書類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月），頁1141。

《皇覽》流風所被，各朝君王或名卿碩彥，多延攬文人抄撰眾籍，編制類書。據莊芳榮先生統計：我國古代類書共有八二四種，若扣除同書異名或疑為同書者，約為七六六種。〔註2〕而據張春輝先生統計，我國古代類書約成書七百多部，現存五百多部。〔註3〕相信是因義界不同，而造成數量的差異，但類書數量極為龐大，乃為不爭之事實。

《皇覽》是魏文帝為撰文便利、治國所需，也為掌握文獻的基本情況與精華，所以下令編修的。後繼的類書編輯目的與功能，也隨著類書漸受重視而產生新變。文學風氣可以刺激類書編成，如《華林遍略》、《修文殿御覽》、《北堂書鈔》、《初學記》、《白氏六帖》等很多類書是為文作詩所編。又，因改朝換代或政局動盪之後，為了沖淡士大夫的故國之思、點綴昇平，也產生了一批類書。如《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淵鑒類函》、《子史精華》等。又，君王為了借鑑歷史、作為施政參考，產生如《冊府元龜》之類者。又，因科舉舉士，類書可為應考利器，所以如《玉海》、《山堂考索》、《事文類聚》、《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源流至論》、《事類賦》、《事物紀原》等應運而生。可知類書之產生因素眾多，不一而足。

《宋書》卷五十五〈傅隆傳〉載：「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疵謬，首尾脫落，難可詳論。」〔註4〕文中所謂「體例」係指書籍編寫格式。圖書編輯必然需要一個能夠呈現編纂目的的方式，也就是圖書體例。雖然類書編輯的動機各有不同，但作為一種圖書，總是該有一個清晰的義界與體例。類書是一種工具書，對照現今發行的所有參考工具書，為了讀者方便查檢，通常會運用許多適當的方式編纂。有按字順者，有按音韻者，有按分類者，亦有按編年或區域等。不同的編排方式，便有不同的體例現象與功效。例如：照字順排有利於迅速查檢；按分類編排，則方便於專題研究工作。〔註5〕

類書當然也有其體例特色，足以令其獨立於書海而不與其他體例書籍相混淆。如博摭群書原始資料，或片段、或成篇，並依資料主題分類系聯，以類相從等，即

〔註2〕莊芳榮《中國類書總目初稿》「說明」（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2年10月），頁9。

〔註3〕張春輝〈類書的範圍與發展〉（文獻〔總第31期〕，1987年第1期），頁179～190。

〔註4〕《宋書》卷五十五〈傅隆傳〉（臺北：鼎文書局，民國72年），頁758。

〔註5〕但一部完善的工具書，一定會考慮到讀者不同查檢或利用的需要，而會另外編製不同的輔助索引。如一部字典，主要雖依部首順序排列，但在書後也常編有按注音或筆畫順序的索引；又如許多外文百科全書雖正文已按字母序排列，但還是會在書後編相關索引，在一個詞條之下，將與它有關連的詞條集中起來，並指示所在頁數，便於讀者依此分析，查詢更多的相關資料。我國古代類書雖無此完善的服務，但也有其漸進的改善作為。

「兼『百科全書』與『資料匯編』兩者而有之。」〔註6〕。但是類書的編纂，與所有書籍一樣，體例會隨著圖書編輯的思想、技術而更易，亦隨著編纂者的特殊設計而有別，並非固定不變的。要去捕捉一個時有新變的體例，並將之清晰界定，本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所以歷來學界因對於類書定義的差別，導致各家所認定的類書範圍不一。

如《宋史·藝文志》將政書及叢書都歸入類書。《明史·藝文志》則把政書歸入史部，但仍將叢書歸入類書。《四庫全書總目》則將所有的姓氏書都歸入類書。《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類書之部》收錄更寬，它將姓氏書、政書、日常常識書都歸入類書。在今人論著中，則有人將《天工開物》〔註7〕、《七修類稿》〔註8〕等都歸入類書。可見古今學者對類書的定義、範圍理解都不一。主張從嚴定義者，以為：

因此，將《皇覽》作為類書之祖，是完全正確的。而十通、會典、會要等雖在政事範圍內內容廣泛，分類編纂，但其為編寫而成，故應入史部，不應歸入類書，而《冊府元龜》、《經濟類編》才完全符合類書條件。以《全芳備祖》與《天工開物》相比，二者都分類編排，但前者乃資料匯編，應屬類書，後者乃單一作者撰寫，分類編排的科技專著。再以《宋朝事實類苑》、《太平廣記》與《七修類稿》相比，前兩者乃資料匯編，應為類書，後一種乃屬單一作者撰寫，分類編排的筆記，不能歸入類書。姓氏書中，凡引用原始材料者可歸入類書，其它應歸入史部譜牒類。還有叢書，如《儒學警悟》、《津逮秘書》、《漢魏叢書》等，它們專門匯集獨立、完整的圖書，再冠以總名，與類書按類歸納片段資料截然不同，這也是很清楚的。〔註9〕

但是主張放寬定義的，除將《通典》視為類書，還將《昭明文選》、《文苑英華》、《古文辭類纂》等書，都視為是「按類條分件繫，原文照錄或摘錄的類書」。〔註10〕其間差異之大，豈能以千里計。

類書之義界不清，也導致類書淵源說的分歧。為何要追溯追尋類書源起，因唯有如此才能考察類書各個階段的發展與流變，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意義。當人們學會撮取大量資料中之特定部分，加以彙編運用時，已經發展出一種資料運

〔註6〕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頁。此說非承認類書為百科全書，只是試圖說明類書性質。

〔註7〕 洪湛侯〈類書溯源〉（圖書館學通訊，1980年2期）88頁。

〔註8〕 闕勛吾《怎樣使用歷史工具書》（遼寧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頁。

〔註9〕 張春輝〈類書的範圍與發展〉（文獻，1987年第1期），頁179～190。

〔註10〕 夏南強《類書通論》第一章〈類書的性質〉（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頁16。

用的概念，但在未集結成書，或所取摭範圍、篇幅、數量不大，未成氣候之前，這種行為只是一種醞釀的必經形態。學界因對類書醞釀過程的過分強化，以及對「淵源」的定義差別，所以對類書起源有許多說法，如起源於《詩經》、起源於《爾雅》等。還有以「遠源」說來模糊焦點，似乎什麼都像類書，什麼都可能是類書的祖先，只要有一個特徵或現象相似，都會被引述為類書「遠源」。

例如于大成先生在《類書薈編·敘》一文中云：

類事之書，昉自《皇覽》，推厥原始，蓋出於《詩》。〔註11〕

于氏在次年所發表的〈談類書〉一文意見相同：

自宋朝的王應麟以來，咸以為此類之書（類書），最早的是魏文帝的《皇覽》。但吾人若推求其淵源，卻可以遠溯到戰國時代。……其實，吾人若推究一下彙集各類事物之書，最早，可以上推至《詩經》。〔註12〕

于先生提出「類事之書，昉自《皇覽》」，似乎同意《皇覽》為類書的起源。但又將類書的「原始」，上推以《詩經》為最早的「類事之書」。《皇覽》為類書，于氏以「類事之書」稱之，那類事之書便是類書之意。言下之意《詩經》豈不成為最早的類書？但下文又云：

雖然，分別部居，以類相從，前此固有其書矣，其書為何，斯《爾雅》是已。《爾雅》者實後世類書之權輿也。

「分別部居，以類相從」，是類書的特色之一，還不能斷定于氏稱《爾雅》為類書，但說「《爾雅》者實後世類書之權輿也」，就清楚的表示以《爾雅》為類書之源。一篇論文中先後以「昉」、「原始」、「權輿」來稱三種時代懸殊的文獻作品，其實已經混淆了淵源的概念。

筆者以為：類書體例一定經由長時醞釀，非一蹴可就。一種體例的成立，必須要有一本書的成形，符合類書的所有特質，才能算是一個源頭。它不可能空穴來風，但也不能將一切的可能牽連都算進族譜中。這樣有失「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研究目的。類書的編纂，絕非是隨意彙集、任意檢錄資料。編修者的學術能力是否深厚？對事物的見識是否獨到？邏輯思維是否清晰？都關係到類書體例的建設，與內容選擇的優劣，當然也直接關係到類書的品質。編者豈能不愼？

從第一部類書問世，理論上其體例雖呈現統一性，卻也因為時代需求呈現新變。隋唐之前類書均已亡佚，若就隋唐以降現存類書體例觀察，隋唐類書中，《北堂書鈔》部類順序與《藝文類聚》不同，而天、地、人、事、物的部類排序，為後代絕大多

〔註11〕 于大成《類書薈編·敘》（木鐸，民國64年11月第三、四期合刊），頁26～27。

〔註12〕 于大成〈談類書〉下（出版家雜誌，第51期，民國65年10月），頁40～41。

數類書繼承。《藝文類聚》子目下，先錄「事類」，後徵詩文，但相差不多時的《初學記》子目之下先「敘事」，次「事對」，後「詩文」。宋代《冊府元龜》專錄歷代君臣事蹟，按事類和人物分門編次。首創部有〈總序〉、門有〈小序〉。吳淑《事類賦》更將所引資料內容編成一賦，再列資料原文。高承《事物紀原》，專求源起；王應麟《玉海》部類僅限於天文、地理和典章，還設提要等。《永樂大典》「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古今圖書集成》分六匯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先匯考，次總論，又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等項等。類書體例一直有所新變，每一本類書對前修者的繼承與革新，一定有其取捨考量。而其中奧妙豈是三言二語可以盡述，怎能不細心體察。圖書是人類文化創造活動的外在表現，類書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從產生、形成、發展到衰落，從內容到體例，都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背景。因此，要深入研究類書淵源與體例這個課題，就必須同時觀照其編纂時的社會文化背景。

類書在中華文化發展中有重要地位，但或受百餘年來類書地位下降的因素影響，前賢對其研究著力略少，所以筆者不揣鄙陋，嘗試探究類書淵源與其體例形成的種種，因學力不逮，還期方家學者指正為禱。

貳、研究範圍與方法

綜觀學界過去研究成果，張滌華、聞一多、方師鐸、劉葉秋、胡道靜、夏南強諸君都曾對類書做過較整體的研究，分別對類書的性質、淵源、演進、分類等問題做了不同程度的闡明，但仍有可發揮的空間，或有值得重新探討之處。目前所了解的類書主題學位論文，兩岸共有二十四篇，其中五篇為博士學位論文。內容以《太平廣記》為範圍，做小說專題研究者最多，佔了九篇。其它還論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永樂大典》、民間日用類書、類書與中國文化等議題者。單篇論文目前收集到的約近四百篇（請參閱附錄一）。常因篇幅限制或刊物要求條件不同，學術表現層次不一。例如目前已收錄的論文中，探討整體類書發展的「總論」者佔大多數；或篇名標上「淺談」、「漫說」、「初探」、「略論」等字樣，在有限的篇幅中，對問題的探討常是片面的，即使有部分文章能以類書發展的歷程為論述重點，實際上也未脫離概述的層次。比較起來，目前所收「分論」的資料較少。這些文章主要在介紹各單部類書的文獻狀況，包括編輯的動機源起、編者生平、全書體例、子目內容以及評價等。另外一個狀況是，研究論文本已嫌少，而卻與學位論文一樣，集中在《太平廣記》、《古今圖書集成》等幾部知名類書上。此外對類書目錄研究的

論文更少，大抵討論類書在圖書館學上編目著錄的方式為主，沒有深入傳統目錄作發展沿革的探討，或發掘編理工作中的心理與背景，或各類目間的微妙互動關係等問題，因此亦仍有許多空間可供學者探索。

目前類書研究資料，在探討的廣度不足，著重時間縱向的資料陳述，而缺乏橫向多層次歷史背景參證，使得類書研究偏於文獻整理層次，而缺少文化意義的解析與開發。試想：類書體制本為人們需求而生，但在千百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為了滿足於該時代的需求，而產生的漸進演變為何？這種演變與人們生活、學術發展的關係為何？科技的演進，對類書的體例、內容是否有所影響？社會結構的差異，或貿易型態的差異，或交通事業的發達等等，是否都直接間接影響了類書的編纂。這些都必須透過整體的類書發展史，進行深度的梳爬、研究，才能分明呈現。試想如果透過這些基礎文獻梳理，既可提供一般學者在研究上的文獻指引，發揮敘錄的功能，亦可能立足在這些成果上繼續發展剖析，更直接裨益於類書發展史之建立，並促類書新時代的發生。

本文研究範圍定以 1911 年為限，在此年之前編輯之類書均在研究範圍中〔註 13〕。因為中國類書的發展史若以《皇覽》為權輿，一千多年來，經歷多樣時空變化成果本已豐碩，而日後仍必有新的類書問世，為免研究範圍無限擴張而設定時間點。雖然以政權更替時間作為斷限，必然無法精準，但中國古籍圖書之編纂，至清已達巔峰，而民國之後，各種外在文化影響，對圖書內容起了革命性的變化，與「古籍」有極大的差異。故多所考量後，謹配合人們認知的習慣，選擇一個分界，以為研討的參考點。

本文研究範圍：一、針對既有的類書概念作追溯。期望藉由類書傳統概念的回顧，同時察查以往類書淵源與體例研究上的問題，以建立一個明確的研究主題範圍。二、就類書的體例與流變作探討。期望建立明確的類書義界，以追考類書源起。另一方面，針對類書間不同的特色研究，期望洞察這些特色產生的原因。這種「同」與「分」的研究，將有助於掌握類書與當代文化共同脈動的跡象。三、就類書發展史觀察，分期探討類書在發展中，各種新體例的形成。四、體現類書體例在中國圖書文化中的意義。在表層的文獻現象中，開展其理論內涵與深刻意涵。

本文研究方法：一、以歷史發展的縱向結合橫向相關之內容；再以文獻整理彙纂為軸線，追溯魏以前文獻整理的情況，掌握古籍編纂的傳承。觀察魏之後歷代類書體例或內容的差異並提出說明，並將同時代的政經文化背景納入，更配合圖書市

〔註 13〕此為參考多數學者對「古籍」之定義。如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4～5。

場、印刷術等相關資料，以求還原類書編纂當時種種現況。二、以比較法呈現研究對象的縱橫間之差異：如以類書與其他編纂圖書作比較，體察在統一脈絡中的類書體例與內容的特色，更期了解各個轉變點上與其他圖書的關係。其次，將各個同時代的類書，或前後不同時代的類書相互比較，以見各期特色。再從其演進過程中，比較前後期編纂方式與形式的改變，檢討類書對傳統圖書形式滲透與異化的情形。三、以文獻考證為主體，以物質條件為輔助證據：文獻考證自然為研究的基礎，以便作為論述的直接依據。而圖書文獻的產生，自有其物質、科技等客觀條件的因素影響，隨著各類書出版年代的印刷術、紙張生產等，技術或市場經營理念因素的改變，必然會造成圖書事業的波盪，類書編纂的盛衰，所以本文列入同步考量。四、以計量數據為依據，嘗試解讀分析，以作綜合研判：研究資料中有可量化的部分，或可反映類書在發展過程中的各項消長情況。如類書數量的統計，或可說明類書成長狀態，分別出醞釀、發展、乃至鼎盛各期；數據的增減或可反映出當代學術風潮與社會因素；數據的運用，或可對歷代編輯、刊刻者的身分與地域作分析，這些均可作為補強論述的依據。

參、結 語

目前學科領域，分門別類，其數量之多，已令人嘆止。但每門學科都有其清楚的義界，而每一門類都是在歷史特定條件下所發展出來的。門類的產生並非偶然，在它形成的那段漫長歷史裡，只能作為一種朦朧的事物現象，還不能凝聚成人類心的一種具有意義性的特定觀念。只有當這種特定指稱產物成形，而且這項產物形成人類最初的某一種特定意識觀念時，這一事物才能真正凝結成為人們追求的歷史源頭，追溯這個源頭的工程，也才能因此建構起來。

追溯類書的淵源，應該著重兩個原則：一是類書的特定性，即類書一詞是特定指稱什麼樣的事物；二是這種特定指稱的產物，是在人類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才能產生。千百年來，類書已成為中國書籍洪流中的一條壯碩支流，它的產生必然有發展的朦朧時期，但當一切主客觀條件聚集、成熟時，第一部類書便應運而生，人類對類書的特定指稱意義也就開始形成。所以本文在追探類書的淵源時，必須要先釐清類書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特定性；也同時求證類書形成所需要的主客觀條件為何，因在這些條件成熟聚集之下，第一部類書方能產生。

本文首先擬由中國歷代重要史志與書目作為首要研究對象，檢驗類書這個特殊體制在千餘年來，學界所認定的特性為何？也藉以提出類書特質的相關問題。其次

爲類書訂定清楚的義界。再藉以反省過去各種對類書起源推定的論點，尋求第一部符合類書特定意義的書籍。然後將藉由主客觀條件，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查察第一部類書創立的各種必要條件，了解該部類書之所以能在該時間點應運而生。當第一部類書產生之時，其特殊體例便已宣告成形。但爲求深入關照，所以將繼續了解隋唐以降的政經環境與科技條件，確定類書修纂工作是否具有良好支援條件。再以「需求」作爲動力，討論類書的功能性與其體例，如何因應各時代不同的需求，衍生豐沛多樣的體例變化。探討各代重要類書體例，從初創到成熟之間的變化，將是本文另一個重點。本文更將就歷代類書體例的興革，推斷類書文化未來的發展。